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新世紀反思自由主義

### 自由主義在新世紀所面臨的挑戰

陈方正

今日的「西雅圖99」或「熱那亞01」事件有其不可忽視的社會與文化意義：在傳統社會主義運動轉趨沉寂，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這宰制全球的意識形態如日中天之際，這些事件正就代表一般民眾對這大潮流的反應與挑戰。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與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際，西方內部這一民間對建制挑戰的意義與前景，是值得中國知識份子注意和研究的。

二十世紀90年代初，世界兩大陣營的激烈爭持陡然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與方式結束，全球化浪潮亦同時猛然高漲，為二十一世紀的新天地拉開序幕，引致「歷史終結」的驚呼。人類對新世紀來臨的熱切期待不難理解，對其前景卻未見過份樂觀，上一世紀初如此，現在仍然如此。1999年底世界貿易組織(WTO)在西雅圖所遭遇空前龐大與激烈的抗爭，令世人吃了一驚，但先進工業國家的政治與財經首腦顯然尚未清醒過來，對問題性質與深度更沒有確切了解，而僅視之為習慣性抗議份子與具無政府主義傾向群眾之發燒與搗亂，今年從而繼續有6月瑞典哥德堡(Göteborg)以及7月意大利熱那亞(Genoa)更為激烈乃至釀成流血慘劇的騷動。看來，今後這一類世界首腦會議可能必須移到更容易控制群眾的地方乃至軍艦上召開了，這對於以民主、自由、開放為標榜的西方社會領袖而言，無論如何自圓其說，恐怕亦不免成為莫大諷刺。

誠然，諸如英國十五世紀的羅拉德派(Lollards)和十七世紀的平等派(Levellers)那樣激烈反建制的群眾運動，歷史上屢見不鮮，也許不值得大驚小怪。不過，大風起於蘋末，他們的口號、論調、思想雖似狂熱、散漫、缺乏系統理據，卻往往亦是深刻問題的反映，是諸如宗教革命和光榮革命那些鉅變的徵兆。同樣，今日的「西雅圖99」或「熱那亞01」事件亦自有其不可忽視的社會與文化意義：在傳統社會主義運動轉趨沉寂，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這宰制全球的意識形態，以及它所宣揚、支持的商貿全球化浪潮如日中天之際，這些事件正就代表一般民眾(而非僅呆在書齋裏的知識份子)對這大潮流的反應與挑戰。中國決意以西方為師而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垂二十餘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這一既定國策現在也已經逐步落實了。際此關頭，西方內部這一民間對建制挑戰的意義與前景，是值得中國知識份子密切注意和仔細研究的。

## 一 自由與平等的張力

如所周知，在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出現既立足於政治訴求，亦復反映經濟政策主張。從洛克(John Locke)、邊沁(Jeremy Bentham)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謂古典自由主義，其要義就在於以法治保障財產、人權，規範國家權力與功能，以市場機制替代人為經濟干預，從而創造一個寬鬆、自由但不乏基本秩序的社會。在其中，秉持天平的蒙眼法神與市場的無形之手保證了體制的客觀性與公義性，由是帶來長期穩定與強大活力，為資本主義的成長創造了環境，也為英美兩國近二百年政治經濟的飛躍發展奠定基礎。倘若說這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在現代所發現的一大秘密，所創造的奇迹，當不為過。然而，高度自由帶來活力，卻也同時產生不平等，這不平等並非原來的秩序或者市場所能改變的——恰好相反，在既定秩序下它往往被加固甚至劇化，它的消除，只能借助於超出原有自由主義觀念以外的政治運動。從1832至1922近百年間，英國經歷了三次擴大議會選民範圍的運動，才終於實現全民普選的理想<sup>①</sup>；美國經歷了1929年經濟大蕭條的震撼，才逐漸接受有限度福利國家觀念，這些可以說是修正自由主義之必要的最好例子。

當然，隨着新觀念的出現與接受，自由主義本身的論調也同時會轉變，這無疑是它富有彈性和生命力的表現。因此，純正的自由主義理論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用了整整一本以《社會正義的幻象》(*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為題目的書來論證「『社會正義』的理念是全然空洞、無意義的」<sup>②</sup>，另一位同樣激烈不妥協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卻不得不勉強承認，最低限度社會福利可能有正當性：「他(自由主義者——筆者按)也可能贊同國家的紓緩貧困措施，因為這是社會大多數達到一個共同目標的更有效途徑」<sup>③</sup>。事實上，如弗里德曼所抱怨的，自從30年代以來，在美國政治辭彙中，自由主義所代表的已經不復是十九世紀的「申張自由，亦即促進福利與平等之最有效途徑」，反而是「福利與平等作為自由之前提或替代品」<sup>④</sup>，也就是說，自由與「福利、平等」已經主客易位，本末倒置了。「平等」或「社會正義」容或在理論上是個模糊、難以清楚界定的概念，因而成為自由主義者的上佳攻擊目標，不過，它的實際訴求卻頑強地揮之不去，無法抹殺，始終與自由主義之間維持強大張力。因此，70年代以來，不但歐洲出現了強調商議民主的所謂「第三條道路」，即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除了以哈耶克、弗里德曼、諾齊克(Robert Nozick)等人為代表的「原教旨派」自由主義，以及貝爾(Daniel Bell)、弗蘭克爾(Charles Frankel)等追求「起點平等」的「精英自由主義」(meritocratic liberalism)這兩派以外，又出現了諸如羅爾斯(John Rawls)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那樣追求「結果平等」的新派「平等自由主義」(egalitarian liberalism)，他們和從社會主義蛻變而來的「激進平等主義」(radical egalitarianism)<sup>⑤</sup>在理念譜系上其實已相當接近了。

從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中葉這一個半世紀之間，世界經濟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迅速，然而大體上還具有相當連續性，自由主義的蛻變亦因此還有迹可

「平等」或「社會正義」容或在理論上是個模糊、難以清楚界定的概念，因而成為自由主義者的上佳攻擊目標，不過，它的實際訴求卻頑強地揮之不去，始終與自由主義之間維持強大張力。因此，70年代以來，不但歐洲出現所謂「第三條道路」，即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也出現諸如羅爾斯等人的新派「平等自由主義」。

尋。然而，到了二十世紀80、90年代，由於科技變革的影響，全球經濟與資本主義獲得了爆炸性動力而「起飛」，瞬即成為大部分人甚至學者都難以辨識其真正面目的事物。在此新形勢下，自由主義對新時代的適應也就成為全新課題了。

## 二 巨無霸公司治下的世界

在二十世紀末的二十年間，世界經濟結構最重大、最矚目的變化，就是少數工業先進國家開始主宰全球經濟；而數百家巨無霸型跨國公司又靜悄悄的控制了這些先進國家的經濟乃至政治。說來奇怪，注意和真正了解這個鉅變的，既非哲學家也非經濟學家，而是柯爾頓和諾蘭這些從資本主義核心體制裏面跑出來的人物。

在二十世紀末的二十年間，世界經濟結構最重大、最矚目的變化，就是少數工業先進國家，亦即所謂G7國家<sup>⑥</sup>，開始主宰全球經濟：它們僅佔全球人口12%，但本地生產總值(GDP)則佔66%<sup>⑦</sup>；而數百家巨無霸型跨國公司(更準確的應該稱為跨國公司法團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它們大致可以以《財富》(*Fortune*)雜誌每年所開列的「全球500」(Global 500)大公司為準——又靜悄悄的控制了這些先進國家的經濟乃至政治。這類公司的絕大部分(86%)總部設於G7國家，其總營業額達到後者GDP的54%(表1)。說來奇怪，注意和真正了解這個鉅變的，並不是站在資本主義世界外部的哲學家，甚至也並非象牙塔中的經濟學家(他們在巨大學術壓力下往往變為高級工程師，或者不自覺地充當了福音佈道員的角色)，反而是從資本主義核心體制裏面跑出來的人物，例如柯爾頓(David C. Korten)和諾蘭(Peter Nolan)<sup>⑧</sup>。前者最近風靡一時的新著以驚心動魄的《當公司統治世界時》<sup>⑨</sup>為題，詳細分析了這個現象所帶來的深刻危機；後者去年發表的〈中國大型企業還將何以立足〉<sup>⑩</sup>從另一角度客觀、冷靜地分析了中國在此危機中的處境，其效果同樣震撼心弦。我們要了解自由主義在新世紀面臨的挑戰，正好以他們的分析為切入點。

「巨無霸公司」的力量並不全然由於獨佔或宰制某一行業(雖然這亦往往是重要因素)，而更是由於其極端雄厚，名副其實「富可敵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其高

表1 地區經濟力量與該區《財富》「全球500」公司比較，1999

地 區	人 口		年總產值 (GDP)		本區內之「全球 500」公司		
	(百萬)	佔全球比例	(US\$10億)	佔全球比例	公司數目	年營業額 總和 (Rev) (US\$10億)	Rev/GDP
全球	6,010	100%	30,878	100%	500	12,696	41%
G7國家	692	11.5%	20,331	66%	422	11,077	54%
其他先進國家 <sup>#</sup>	148	2.5%	3,023	10%	35	973	32%
部分東亞國家/地區*	1,369	22.8%	2,043	7%	24	466	23%
所有其他國家	3,801	63.2%	5,481	18%	19	180	3.3%

資料來源：Fortune, 24 July 2000; *The World Economic Factbook 2000/2001* (London: Euromonitor 2000)；所有產值以國際標準匯率計算。

# 包括奧國、荷蘭、比利時、瑞士、瑞典、挪威、芬蘭、丹麥、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澳大利亞、新西蘭。

\* 包括中國、南韓、港澳(中國)、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

表2 若干《財富》「全球500」公司與國家經濟力量比較，1999

若干「全球500」公司			國 家					
公司 排名	名 稱	年營業額 (Rev) (US\$10億)	國家 排名	國 名	人 口 (百萬)	年總產值 (GDP) (US\$10億)	本國「全球500」 公司	
							數 目	Rev/GDP
第1-250名總和		9,405	1	美國	277	9,256	179	51%
第1-60名總和		4,394	2	日本	127	4,351	107	67%
第1-20名總和		2,291	3	德國	82	2,102	37	58%
第1-10名總和		1,405	5	英國	59	1,410	38	54%
第1-7名總和		1,068	7	中國	1,268	1,019	9	19%
1	通用汽車	176.6	26	俄國	147	181.8	2	13%
5	戴姆勒— 克萊斯勒	160.0	28	香港 (中國)	6.8	158.6	1	7%
11	蜆殼石油	105.4	38	以色列	6.1	99.2	—	—
92	三菱電機	33.9	59	利比亞	5.5	33.2	—	—
176	和路迪士尼	23.4	62	越南	79	23.2	—	—
231	陶氏化工	18.9	67	古巴	11.2	18.7	—	—

資料來源：同表1。

度整合的組織，嚴密的財務控制，與雄厚的科技、商貿力量。如表2所示，一間名列前茅的巨無霸公司的年營業額高達1,000億美元上下，這大約相當於一個8,000萬人口的中低收入國家，或者一個400萬人口的高收入國家／城市的GDP。例如：通用汽車 (General Motors) 與俄國，戴姆勒—克萊斯勒 (Daimler-Chrysler) 汽車與香港，蜆殼石油 (Shell Oil) 和以色列都在伯仲之間；以中國之大，英、法之富，只不過相當於這類公司前十名左右的聯合力量；甚至富甲天下的美國、日本和德國，亦只不過分別與前250、60、20家公司的聯合力量大體相匹敵而已。今日全球經濟之絕大部分控制於數百家巨無霸公司之手，已無可置疑——事實上，從表1與表2可見，對一個國家來說，其境內此類公司之數目、規模、所佔經濟活動分額，已成為其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了。

所謂「控制」，最基本的意義，是指這些「帝國型財團」(Imperial Corporations) ⑩ 在生產安排與財富分配上所起的巨大與決定性作用：由於其傾國傾城的財力，跨越全球性以及數十百行業的運作，它們在採購和銷售價格、工資與利潤分配、資金調度各方面，都獲得了任何個人甚至經濟力量微薄的城市、地區乃至國家所無法抗衡的決定權。廣大落後地區的工資普遍受到強大壓抑 (耐吉[Nike] 運動鞋在印尼通過極其廉價的外判工而將其七萬五千餘工人的全部工資支出壓低到其付予一位籃球明星的個人廣告費以下，是最突出的例子)，甚至先進國家的低發展區域，諸如美國南部或英國西部，也都不能不對其要求唯恐唯謹⑪。

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少數財團決策層的一個自然社會後果，就是財富分配之高度不均，可以說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在1990年前後，美國頂1%富

「巨無霸公司」的力量來自其名副其實「富可敵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其高度整合的組織，嚴密的財務控制，與雄厚的科技、商貿力量。名列前茅的巨無霸公司年營業額高達1,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8,000萬人口的中低收入國家。以中國之大，英、法之富，只不過相當於這類公司前十名左右的聯合力量。

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少數財團決策層的一個自然社會後果，就是財富分配之高度不均，但更重要的則是，這些「帝國型財團」藉著其雄厚經濟力量左右立法，控制輿論，甚至影響中小學教育。1983年智利民選政府受ITT公司顛覆而垮台，就是美國大公司將其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社會乃至文化力量，從而在國際政治上發揮影響力的例子。

豪的總收入超過了底層40%人民；而全世界人口最富20%的總收入則達到所有其餘人口的4.8倍<sup>③</sup>。但更重要的，則是這些「帝國型財團」很自然地藉著其雄厚經濟力量有計劃、有系統地左右立法，控制輿論，甚至「正本清源」，進一步影響中小學教育<sup>④</sup>。諸如美國槍會 (American Rifle Association) 長期阻撓有關槍械管制的立法，或者汽車工業在有關汽油徵稅以及公共交通網絡建設上的決定性影響，可以說是美國大公司將其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社會乃至文化力量最突出的例子；至於其在國際政治上所發生的作用，就更不必說了——1983年智利民選政府之受到ITT公司顛覆而垮台，當是近年最為人熟知的典範。

作為龐大商業機器，這些財團的唯一目標是追求當前利潤。由於其力量之雄厚，這一目標在政治與社會上轉化為經濟增長的盲目追求，從而連帶產生了環保、資源浪費、廢物泛濫成災等全球性嚴重問題。德格 (William Dugger) 的觀點無疑會被目為過激，但他將帝國型財團比喻為長生不死，可以無限膨脹的巨無霸怪物 (Frankenstein)，而其對人類社會的宰制已近乎整體與全面，則不能不承認的確有相當道理<sup>⑤</sup>。

### 三 對自由主義的挑戰

在十九世紀，政治上的人權、法治、自由訴求與經濟上的自由主義並行發展，兩者雖然被認為相關，但只不過是相互促進，而且主要還是政治自由促進經濟自由與成長，遠遠未曾達到密不可分，結為一體的地步。但到了二十世紀，由於始而對法西斯主義，繼而對共產主義抗爭的需要這一動力所驅使，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卻越來越緊密，甚至寢寢然有融成一體之勢。弗里德曼在其宣言式的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斷言：「它 (意指本書——筆者按) 的主旨在於：競爭性資本主義 (即大部分經濟活動是通過在自由市場運作的企業組織起來) 是個自由經濟體系，亦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重點為筆者所加)，又說：「就其作為達到政治自由這一目標的手段而言，經濟體制的重要性在於它之影響權力之集中或分散」<sup>⑥</sup>，這可以作為自由主義在政治與經濟理念上結合的最清楚表述。但證諸資本主義在過去二十年的實際發展，他這一說法就引出兩個基本疑問來了。首先，倘若競爭性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運作受到國家強力干預，例如通過稅收改變收入分配，推行大量社會福利等等，那麼政治自由是否一定受影響？其次，在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體制下，權力是否必然分散？政治自由是否必然有更大空間？換而言之，政治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是否與資本主義有必然關係？

這兩個問題在表面上似屬理論性質，但實際上都可以通過對政治現況的考察而得到清楚答案。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我們只要看英國及北歐，特別是瑞典，在60至80年代間所推行的量工業國有化以及高稅、高社會福利政策，而同時維持高度法治以及議會民主，便可以知道雖然在歷史上資本主義 (最少是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體系) 與議會政治的確同時出現，而且密切相關，但在當代世界則很難說不受任何干預的自由經濟體系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最少，公共經

濟領域的擴大，並不一定影響人權、法治、代議政制。換而言之，在現實中自由主義的政治部分（那也是它對一般知識份子最具有吸引力的「光環」）和它的經濟部分並沒有必然關係。當然，過份受干預的市場經濟效率的確可能顯著下降，但那完全是另一個問題，與政治自由並不相干，這是必須辨明的。

至於第二個問題，則答案也很清楚。由於過去40年間跨國公司的飛躍發展，其操縱性力量之變質，以及少數實力與國家相埒的巨無霸「帝國型財團」之出現，顯然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權力並不一定分散，所謂「政治自由」亦不一定有更大空間。誠然，由是而導致的權力之高度集中，以及相應的政治空間之實質壓縮，並不意味議會政治以及法治受到打擊或被取消：恰恰相反，「帝國型財團」是繞過了這兩種機制，甚至進一步反過來包圍、控制和直接利用這些機制而實現其政治宰制的：孫子兵法中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此得到了全面和深刻體現。從這個角度看來，自由主義最大的挑戰其實是來自它本身：它所孕育的資本主義成長與壯大之後，就有反過來顛覆其原有理念的可能。

說得更具體一點，在十九世紀，市場經濟活動大致以個人以及力量彼此大致相當的商業組合為主導。然而，自20年代以來，這一狀況即已不斷改變：時至今日，真正重要的經濟活動單位已經是公司，特別是具有法團地位的巨無霸上市股份公司（imperial public corporations），而非復個人，甚至也並非一般的商貿公司。具有法人地位的財團是當代經濟制度的產物，然而卻有極久遠和強固的法制觀念作為基礎<sup>①</sup>。它之可畏，之所以具有顛覆自由市場機制的潛能與傾向，是在於它一方面具有自然人的絕大部分功能與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卻又遠遠超越自然人的限制。例如，就經濟活動而言，它和個人完全一樣：公司法團可以進行市場交易，訂定契約，擁有或處理事業、財產，提出訴訟或被訴，成為協會、聯盟或其他組織的成員，發表言論，游說國會等等。與自然人相比，它唯一缺乏的，只是個人政治權利，即不能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不能投票、參選、從政。但這方面的限制，它卻可以通過發揮政治影響力而補足<sup>②</sup>。另一方面，公司法團有好幾方面是遠遠為自然人所不及的：首先，它的生命沒有自然限制：除非自動清盤或者由法庭或議會頒布命令，它永不會消失——也就是說，它雖然可能因「疾病」或意外而死亡，或被判死刑（我們都知道那是多麼困難和罕有的事），但在正常狀況下卻永遠不會因為衰老而死亡，原則上可以長生不老；其次，通過市場集資、相互合併、分設子公司等方式，它可以無限擴張、變化、生長、繁衍，而不必如自然人之必須忍受軀體上的先天局限。很明顯，個人甚至家族或者小本經營的私有企業與這樣的長生巨無霸在能力上屬於全然不同的數量級，二者絕對無法相比。前者要與後者競爭，等於凡人挑戰奧林匹斯諸神，是注定失敗的。

然而，法人公司制度之存在，其實已經有數百年歷史，為甚麼它的宰制性，要到二十世紀的80、90年代才顯現出來呢？這一方面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其內在階段：具有客觀結構的股份公司法團取代梟雄式的個人富豪，以及這些公司通過大量合併<sup>③</sup>而蛻變為巨無霸，再通過充分利用其經濟力量而操控市場與議會政治，其相關意識與組織方式都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成熟。更重要的，則是科技

「帝國型財團」公司之可畏，之所以具有顛覆自由市場機制的潛能與傾向，在於它一方面具有自然人的絕大部分功能與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卻又遠遠超越自然人的限制。首先，它的生命沒有自然限制，永不會衰老死亡；其次，通過市場集資、合併、分設子公司等方式，它可以無限擴張繁衍。

與國際政治基礎的改變。在二十世紀下半電腦與通訊技術的飛躍發展，以及財務及會計管理技術的進步，令少數人有效地管理、控制、推動牽涉數十萬員工以及數千百億資金的龐大全球性商業帝國成為可能；同時，冷戰與意識形態對抗的結束，也為全球市場的開放，以及帝國型財團的進一步發展鋪平道路。

所以，回顧過去二百年間民主政治及市場經濟發展的歷程，不能不承認自由主義當初出現時的那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今天已經徹底改變了：控制市場的，也許仍然是「無形之手」，但這隻手所代表的，已非復各為私利籌劃打算的許多個人，而是能夠影響政府，左右輿論，在無形之中操縱數千百萬人命運的數百家跨國財團了。在很大程度上，這巨變正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這一強力組合的成功所致，但饒是如此，我們仍然不能不承認，這異化了的自由主義正在反過來顛覆其原本理念，迫使我們重新檢驗它的理據。

#### 四 自由主義能修正嗎？

在二十一世紀，巨無霸跨國公司顯然將繼續宰制世界，因此，由之推動的高經濟增長追求在社會、文化、環境生態等各方面所產生的嚴重問題，今後很可能進一步惡化，甚至導致災難性後果的出現<sup>②</sup>。所以，也不能不正視，作為支撐這樣一個世界的重要理念，自由主義有繼續修訂、發展的必要。但是，這真有可能嗎？

當然，自由主義有許多不同論述，並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有一個明確而嚴謹的理論架構。而且，如上文所提到，在過去百年間，它實際上也早已經歷了重大修訂，即經過20、30年代的經濟風暴之後，承認社會福利的正當性及需要，以及政府由之而來的責任與權力。這修訂部分消解了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緊張，亦在一定程度上解開了政治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緊密關係。因此，上述問題相當於：有可能以自由主義之中的政治部分，即民主（即議會政治）與法治，來制衡其經濟部分的弊病，即資本主義的過份發展，特別是跨國財團的龐大勢力，從而建構更合乎人性的全球秩序嗎？那也就是說，「消極自由」能轉化為「積極自由」嗎？

在原則上，這似乎是可能的：也許瑞典與北歐在70、80年代的體制就可以視為範例。然而，在實際上，這種想法卻有多重不可忽視的基本困難。首先，保留自由主義中的政治自由部分而修正其經濟部分雖然是富有吸引力的想法，但帝國型財團這一巨靈從瓶子裏釋放出來之後，又要再哄它縮回到瓶子裏去，其實際可能性到底存在嗎？要制約帝國型財團的存在以及運作方式，並不是僅僅向某一家跨國公司而是向所有此類財團宣戰，並不是打擊它們某一項利益而是從根本來威脅它們的生存方式。以它們目前對法庭、議會、政府行政部門的強大影響力，以及在社會輿論乃至學術界的廣泛動員能力看來，通過西方現行民主體制來制衡它們的可能性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我們不可忘記，這些帝國型財團的地位，正就是過去百年間它們長期有計劃、有系統、鏗而不捨地在西方

今天控制市場的「無形之手」已非復各為私利籌劃打算的許多個人，而是能夠影響政府，左右輿論，在無形之中操縱數千百萬人命運的數百家跨國財團了。在很大程度上，這巨變正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這一強力組合的成功所致，但饒是如此，我們仍然不能不承認，這異化了的自由主義正在反過來顛覆其原本理念，迫使我們重新檢驗它的理據。

政治體制中運用本身力量逐步建立起來的。誠然，自1999年西雅圖大規模抗議浪潮以來，相類行動不絕如縷，而且今後很可能日趨廣泛與激烈。但迄今為止，這類行動雖然在媒體上大出風頭，實際效果則微不足道；而諸如柯爾頓那樣的登高一呼，即使在學術界、新聞界也還未曾造成實質影響。事實上，社會精英大部分是現行體制的得益者，或思想認同者，能感到危機深切而大聲疾呼者，只不過是鳳毛麟角。在沒有直接影響大眾切身利益的嚴重危機（諸如經濟大蕭條或香煙的危害已經無可置疑）出現之前，要根據一種新的理念去改變現行體制是極其困難，甚至可說完全不切實際的。

其次，還須正視，以商業帝國法團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這可稱為「法團資本主義」corporate capitalism）之急速發展並非通過掠奪式的牟利，而是高效率與不斷創新所致。我們今日所坐的汽車、飛機，所享受的豐盛食物，所看的電視，所用的電腦、手提電話——也就是說，塑造我們意識的現代世界事物，無一不是由這些財團為了追求利潤而研究、改良、製造出來。以行政、立法或者其他方式箝制其運作上的自由固然可能解決某些財富分配或環保問題，但同時亦將嚴重削弱它們的效能，從而阻礙以科技發明為基礎的新世界出現。這後果是否能為社會接受呢？現代人會因為環保、廢物堆積、社會不平等問題，而願意自動放棄目前所享受的物質世界，願意從現代世界後退，回到一個能滿足人類基本需要，更平等、合理但不太富裕，較少變化的社會中去嗎？那恐怕是大有疑問的。

第三，即使一部分國家或地區有意拋棄或者拒絕追求前述經濟體制與發展模式，那對此體制、模式也未必有太大影響，因為它本質上具有強大的宰制性與擴散性。倘若不同國家對於科技應用與經濟發展有不同政策，那麼發展策略最猛銳，最不顧及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國家，在短期內其經濟與政治力量很可能變得最為強大，其輸出、散播本身體制的傾向亦最難以抗拒或抑制。假如某些觀察可以入信的話，一個現成例子就是，諸如瑞典和北歐那樣的民主社會主義嘗試，在西方世界這大環境中並不穩定，是可以，而實際上亦已經為外來資本主義勢力所顛覆<sup>②</sup>。因此，政治與經濟體制雖然在原則上可以修訂，但其改變絕非請客吃飯，它肯定牽涉與商業帝國法團的激烈抗爭，乃至國際政治傾軋，恐怕沒有可能在民主體制內和平地、有秩序地完成。更何況：從目前分子生物學、計算機科學，以及機械人科學進展的驚人速度看來，今後不出四五十年間，各種形式的人工生命就已經會以今日無法預料的形式紛紛出現，並且與自然人競爭，取代自然的大部分功能<sup>③</sup>。這一迫在眉睫的大變革已勢所難免，並肯定將對人類社會保存至今的一切價值、規範、信念產生無從估計的顛覆作用。換而言之，過去五百年間效率與科技力量的追求已經累積了巨大動量，今日以帝國型商業財團為標誌的資本主義形式正是這種追求的具體表現，甚至可說是化身。它之不可能被扼制、馴服或逆轉，和四五百年前腐蝕、銷融中古世界的宗教革命、科學革命或啟蒙運動之勢不可當是一脈相承的。

以上我們從社會—政治、經濟以及科技力量等三方面論證，以政治自由主義來制衡、修訂經濟自由主義的種種實際困難。我們現在要進一步指出，即使

我們可能以民主與法治來制衡跨國財團的龐大勢力嗎？以目前帝國型財團對法庭、議會、政府行政部門的強大影響力，以及在社會輿論乃至學術界的廣泛動員能力看來，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沒有直接影響大眾切身利益的嚴重危機出現之前，要根據一種新的理念去改變現行體制是極其困難，甚至可以說完全不切實際的。

假定這制衡、修訂的願望可以實現，其結果仍然並非自由主義的出路：倘若現代資本主義受到另一種體制，例如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 ②的嚴厲制約，甚至為其取代，那麼一個失去了大部分經濟活動與發展自由的社會雖然可以保留相當程度的傳統政治自由 (這「自由」將會有其社群制約的大前提，而非不受限制)，但自然難以說是不折不扣的仍然在奉行「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所提倡的，大體上可以說是「改良中古主義」：要宗教境界，但不要迷信；要伸張地區 (而不是國家) 利益，但不要封建；要科技與市場，但不要法團資本主義；要現代生活，但不鼓勵追求新奇炫異，更不允許過份奢逸。這種小國寡民加上有限度科技的理想靜態社會固然有吸引力，但顯然並非自由主義，而且其實現的可能性即使存在，也還很模糊，很遙遠。

## 五 出路的展望

自由、民主與人權無疑是近代政治史上最有力的觀念，而資本主義也無疑是近兩百年來最強大最有能量的經濟體制。然而，由於資本主義在過去二三十年所發生的形態突變，它與政治自由主義的結合已經遭遇嚴峻考驗。一方面，法團資本主義與以個人為主體的古典自由主義兩者之間距離已越來越遠；另一方面，即使是頗為有限度的社會福利與收入再分配，亦不為諸如弗里德曼那樣的原教旨派自由主義者認同。因此，自由主義正面對喪失普世性意義，日漸淪為意識形態或政治標籤的危險。在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要義在於限制政府，擴大個人活動空間；然而，在二十一世紀之初的今日，在數百跨國財團宰制下，個人經濟活動空間已被壓縮到極小範圍；現在還有能力與財團力量抗衡，為大眾整體經濟利益發言的，只剩下政府而已。倘若認真面對這一現實的話，自由主義要繼續作為一個具有發展活力以及現實意義的理念，根本鉅變殆不可避免，但變的方向到底何在，則尚難辨認。我們認為，在目前的摸索階段，提出整體理想替代方案 (社群主義可說是這樣一個嘗試) 為時尚早，要展望人類社會的未來，應該暫時拋開整體性變革構想，而從下面三點現實形勢出發。首先，是西方所建立的民主與法治體制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其次，是科技主導的變革與相關的經濟—社會建設不可能廢棄；最後，則是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嚴峻社會與環境問題必須解決。在這三大前提下，解決問題的方向到底何在，並非我們可能在此探討。作為本文的結束，我們要在這提出的，只不過是對當前社會運動的一些簡單觀察而已。

這觀察的中心是：建構各種具有共同意識與目標的公民法團，充分發揮並擴大其影響力，也許是在上述前提的強力制約之下，解決問題的自然途徑。這一途徑有好幾個特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它從現有體制出發，尋求有限度地改變現狀，所以起點很低；另一方面，無論從行動方式抑或目標來說，它都超出傳統政治運作模式以外，所以具有逐步改變現行體制的潛能。也許，更重要的是，通過公民法團動員群眾的改革途徑具有高度自我調節的機制：它的力量與成功，雖然與領導者的感召力與理念有關，但至終則取決於大眾對有關問題

自由、民主與人權無疑是近代政治史上最有力的觀念，而資本主義也無疑是近兩百年來最強大最有能量的經濟體制。然而，由於資本主義在過去二三十年的形態突變，它與政治自由主義的結合已經遭遇嚴峻考驗。我們認為，在目前提出整體理想替代方案為時尚早，但建構各種具有共同意識與目標的公民法團，發揮並擴大其影響力，也許是解決問題的自然途徑。

的反省與選擇。所以，這是個緩慢、累積性的過程，但也因此較為穩健，可以反映社會整體深思熟慮的結果。

當然，這樣的行動早已經有不少先例，例如為了環保而不斷戰鬥，並且已經因此在國際上獲得廣泛注意，同時也產生了相當實際效果的「綠色和平」運動就是突出典範。這一類行動在理念上顯然和強調直接參與的所謂「共和主義民主」，或者強調協商、對話、包容的所謂「第三條道路」、「第三類民主」，有相通之處。它可以視為，以相類似於法團資本主義本身所採用的體制，來制衡法團資本主義行為的策略，但其目標則與社群主義整體性地抗拒現代社會的理想，有根本差別。不過，公民法團即使能夠稍為緩和法團資本主義過份發展所造成的災害，它真有能力制衡後者，從而達到調整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長遠目標嗎？畢竟，在抽象與間接的公義基礎之上結合，無疑要遠較在人人可以直接切身感受的私利基礎之上結合為困難。這一關鍵問題的答案，恐怕也並非目前所能預見的了，因為它一方面取決於社會上公民意識的激發與提昇，另一方面則視乎一般民眾感受經濟發展所帶來危機的強烈程度而定，而兩者都是在急速變化之中的。也許，比較可以肯定的只是：無論在西方社會或者廣大的發展中地區，單純以經濟發展和物質建設為目的的單一政治—經濟體制行將產生深刻與長遠變化，而逐漸為在廣泛公民政治動員衝擊下不斷改變的多體制混雜格局所取代。

最後，我們也許應當指出，無論以上的展望是否正確，自由主義的變質將無可避免，其最根本原因是：無論在現代經濟抑或政治體制中，個人都太渺小、軟弱，都必須通過以共同目標而結合的法團才能獲得活動空間，因而也必須認同於此類法團，並且接受其規章與內在動力約束。因此，以個人自由為基本出發點的主義、理念，必然被鎖定於所謂的「消極自由」的狹小範圍內，而由於此範圍在法團資本主義壓迫下日益減縮，其所背負的「自由主義」自也難免逐漸喪失實質意義。當然，「自由主義」是個富有魅力的口號，是個不會輕易消失的光環，所以，可以預期，它也還將為種種不同目的而被長期使用。

公民法團能否充分發揮其影響力，一方面取決於社會上公民意識的激發與提昇，另一方面則視乎民眾感受經濟發展所帶來危機的強烈程度而定。也許，比較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在西方社會或者發展中地區，單純以經濟發展和物質建設為目的的單一政治—經濟體制行將產生深刻與長遠變化，而逐漸為在廣泛公民政治動員衝擊下不斷改變的多體制混雜格局所取代。

### 註釋

① 邊沁的實用主義運動和古典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它既是後者的一部分，但同時又與激進派合作，推動1832改革法案，因此正好視為這裏所說「政治運動」的最早表現。

② Friedrich A. von Hayek, *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vol. 2 of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xi. 中譯本見哈耶克著，鄧正來、張守東、李靜冰譯：《法律、立法與自由》（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

③④⑥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195; 5; 4, 9.

⑤ Kai Nielsen, *Equality and Liberty: A Defense of Radical Egalitarianism*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1985).

⑥ G7國家指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它們依次是全球GDP最高的國家，只有人口超過上述七國之和的中國其GDP超過加拿大（倘按平價購買力計算匯率則在美、日之間）。

⑦ 當然，對中國和俄國而言，以標準匯率而非平價購買力來計算產值會造成很大偏差，但這並不影響下面的結論。

⑧ 柯爾頓出身於美國小城的保守商人家庭，畢業於史丹福大學本科以及工商管理學院，曾任教於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五年，然後長期服務於福特基金會以及美國政府的國際發展署，派駐東南亞14年之久。他是「西雅圖99」運動的策劃者和推動者之一。諾蘭在倫敦大學得經濟學博士，現為劍橋大學朱澤 (Judge) 管理學院講座教授，中國大型企業研究專家。

⑨ David C. Korten,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Bloomfield, Conn.: Kumarian, 2001).

⑩ 諾蘭 (Peter Nolan)：〈中國大型企業還將何以立足〉，《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6月號，頁5-19；有關各國本地生產總值資料(以1999年為準)，見 *The World Economic Factbook 2000/2001* (London: Euromonitor 2000)。

⑪ 「巨無霸公司」又被命名為「帝國型財團」，其特徵見 William M. Dugger, *Corporate Hegemon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18-21。

⑫⑬⑭ 同註⑨，頁115、130-31；113-16；157-59。

⑮ 同註⑪ William M. Dugger。

⑯ 在近代，它是以十七世紀出現的皇家特許海外專利公司，諸如荷屬東印度公司、英屬東印度公司為濫觴；但在西方法制思想中，通過法律規定而產生的獨立法人 (corporate identity) 觀念可以一直追溯到羅馬法，而中世紀的各種宗教、政治制度亦莫不與此有極其密切的關係。見 Ernst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⑰ 對這種影響力之無孔不入，見註⑨，chap. 10。

⑱ 下列有關全球跨國公司合併所涉及的金額及其爆炸性增長率(平均每年55%)正好說明這些公司在近數年的生態突變：1992年：1,560億(美元，下同)；1994年：5,600億；1998年：25,000億；1999年：34,000億，那約略處於當年日本與德國的GDP之間，而為中國GDP的二至三倍左右，視乎匯率計算方法而定。資料來源見註⑩。

⑲ 當然，當代世界的主要問題(主要是生態和人文環境的惡化)到底嚴重到甚麼程度，其成因是否應該完全歸咎於資本主義或少數跨國公司，抑或要承認它是現代化變革中無可避免的現象，那是有爭議的。這爭議中的非主流意見見前引 Korten,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Dugger, *Corporate Hegemony*; 以及 Herman E. Daly and John B. Cobb, *For the Common Good*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Bruno Amoroso, *On Globa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98)。

⑳ 根據丹麥 Roskilde 大學 Jean Monnet 講座教授亞摩羅索 (Bruno Amoroso) 的說法，瑞典社會民主黨首領帕爾麥 (Olof Palme) 在1987年被暗殺，以及北歐的丹麥及挪威隨後之逐步放棄民主社會主義，都並非偶然。見註㉑ Amoroso，頁3-4。

㉑ 例如，見“End-of-Millennium Special Issue”，*Scientific American* (December 1999) 諸文的討論及預測。

㉒ 柯爾頓稱這樣一個較理想的世界為「地區化的市場經濟」，其特點是所有資本都必須受到監管與節制，地區政治力量與利益永遠佔優先地位，消費、生產與財富差距都要受到嚴格規限。見註⑨，chaps. 22-23。達理與可博在其專著中對社群主義有更詳細而系統的論述，中心論點是自啟蒙運動以來的整個現代化進程都必須檢討，特別是需要推行某種廣義，除去了迷信成分的一神宗教，以重整人的性靈生活。見註㉑ Daly and Cobb。